

東北三省高師函授教材

中國現代文學史

下冊

中国现代文学史

(初 稿)

下 册

吉林省函授学院

辽宁教育学院 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

黑龙江省函授广播学院

目 录

第三编 抗战前期的文学 (1937—1942)

第一章 抗战前期的文艺运动

- | | | |
|--------------------|-------|------|
| 第一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文艺 | 运动的发展 | (1) |
| 第二节 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 | (12) |
| 第三节 对反动文艺思想的斗争 | | (19) |
| 第四节 边区和敌后根据地的文艺运动 | | (28) |

第二章 抗战前期的文学创作

- | | |
|------------------|-------|
| 第一节 郭沫若的《屈原》等历史剧 | (37) |
| 第二节 茅盾抗放前期的创作 | (57) |
| 第三节 艾青、田间、柯仲平的诗 | (72) |
| 第四节 张天翼、沙汀、艾芜的小说 | (89) |
| 第五节 夏衍等人的剧作 | (105) |
| 第六节 报告文学的发展 | (113) |

第四编 抗战后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的文学 (1942—1949)

第一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文艺 界整风运动

- | | |
|----------------------|-------|
| 第一节 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 (124) |
|----------------------|-------|

第二节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内容和意义	(131)
第三节	对王实味反动文艺思想的斗争	(142)
第四节	新的人民的文艺	(146)
第二章	解放区的小说和散文	
第一节	赵树理的小说	(153)
第二节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165)
第三节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	(175)
第四节	孙犁、康濯的小说	(184)
第五节	《新儿女英雄传》和吕梁英雄传	(193)
第六节	其他小说和散文创作	(203)
第三章	解放区的诗歌创作	
第一节	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	(216)
第二节	阮章竞的《漳河水》	(228)
第三节	其他诗歌创作	(237)
第四节	陕北民歌	(246)
第四章	解放区的戏剧创作	
第一节	群众性的秧歌运动和戏剧创作	(253)
第二节	《白毛女》	(259)
第三节	旧剧改革和《逼上梁山》	(271)
第五章	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创作	
第一节	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发展	(279)
第二节	对错误的和反动的文艺思想的斗争	(283)
第三节	《升官图》和国统区的戏剧	(291)
第四节	《马凡陀的山歌》和其他政治讽刺诗	(301)

第一章 抗战前期的文艺运动

自 学 提 要

本章重点叙述抗战前期的文艺运动、文艺思想斗争方面的情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由于党的积极倡导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以及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顺应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它的建立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上海失守后，全国的文艺中心一度移到武汉。文协成立初期，以武汉为中心曾把抗日救亡的文艺宣传搞得有声有色。学习本章，应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经过和文协成立的情况及其活动和作用。

武汉失陷后，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奔赴重庆，在国统区以笔作武器，顽强地从事文艺斗争；另一部分则到了延安，在党的领导下，热情地进行文艺创作，大张旗鼓地开展群众性的文艺运动。

围绕着文艺要不要为抗战服务和如何为抗战服务的问题，延安和重庆等地的文艺界都开展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国统区的进步文艺界还开展了对文艺“与抗战无关论”、“反对作家从政论”和“战国策派”的批判和斗争。要了解上述讨论和批判斗争的经过、各自的观点及意义。

本时期的文艺创作，国统区分武汉失守前后两个阶段。前段发展较快，后段由于受到压制而曲折发展。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的文艺创作获得蓬勃发展，要了解其原因、标志、成就和特点。

第一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文艺运动的发展

一九三七年，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抗日高潮的进一步形成，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文艺运动的发展。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由于国民党奉行不抵抗政策，致使大片国土沦丧，民族危亡日趋严重。中国共产党一直主张坚决抗击日寇侵略，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化上抗日，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我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同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重要报告。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

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制定了基本策略，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得到全国各界各阶层，包括国民党军队中爱国将领的热烈赞同和坚决支持。一九三五年底，以北平学生为先导的“一二·九”爱国运动，标志着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西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反映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我们党派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去西安，经过艰苦的工作，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毛泽东同志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向芦沟桥进攻，中华民族处在危急的严重关头。七月八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宣言，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驱逐日寇出中国”！七月十五日，党中央又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并派周恩来同志前往庐山与国民党谈判，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为实现全面抗战路线而斗争。由于我们党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压力，同时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八·一三”向上海进攻后，严重威胁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及其主子美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国民党统治集团才不得不接受我党的合作抗日的主张。九月二十二日，蒋介石被迫发表了我党于七月十五日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的宣

言。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二、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全民抗战的新形势，促进了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了文艺运动的发展，使抗战文艺运动出现了新局面。

（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

早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的时候，全国文化界就一致响应了学生运动，要求团结御侮，抗日救亡。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一九三六年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适应抗日需要，宣布自动解散；同年五月，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当时抗日救亡刊物风起云涌，全国不下千余种之多，单是上海一地就有一百多种。《大众生活》、《永生》、《新学识》、《生活知识》、《妇女知识》、《世界知识》等，就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刊物。这些刊物大部分都是上海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创办的，主张不分新旧，不分阶层，不分党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文艺作家，都应该在抗战救亡的总目标下，组成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文艺为武器，抗日救亡。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部分作家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另一部分作家又共同签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北京的作家也成立了《文艺界抗敌协会》。这些团体都要求成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同年十月，《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发表，指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能“团结御侮”，必须“不作妥协之让步”，号召“全国文学界同人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在这篇宣言

上签名的有：巴金、王统照、包天笑、沈起予、林语堂、洪深、周瘦鹃、茅盾、陈望道、郭沫若、夏丐尊、张天翼、付东华、叶绍钧、郑振铎、郑伯奇、赵家璧、黎烈文、鲁迅、谢冰心、丰子恺。这些人包括了当时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其范围之广，空前未有，这就奠定了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为一九三八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二）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抗战暴发后，著名作家郭沫若、茅盾等，就写文章，办刊物，为全面抗战奔走呼号；许多文艺工作者冲破国民党设置的种种障碍，纷纷走向战地、农村和城镇，从事抗日救亡工作；许多爱国知识青年也积极投身于抗日文艺宣传活动，很快出现了文艺的新局面。但是，抗战初期作家们的这种活动，还是小范围的，分散的，没有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计划，不能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为了更加广泛地团结和组织文艺界一切抗日力量来更好地为抗战服务，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至此，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文协”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大会宣言和提案，选举了理事和名誉理事。“文协”选举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老舍、郑振铎、冯乃超、田间，罗荪，刘白羽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当时，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做政治工作的周恩来同志被选为名誉理事，并在“文协”成立大会上讲了话。“文协”宣言指出：“对国内我们必须喊出民族的危机，宣布暴日的罪行，造成全民族严肃的抗战情绪和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争取最后胜利；对世界我们必须揭露日本侵略者的

罪行，引起世界人民的正义感，以共同制裁侵略者。”“文协”的成立，标志着在党的领导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形成。它包含了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文艺家和其他一切新旧文艺界爱国人士，实现了以革命的和进步的文学家为核心力量的，适应全民抗战需要的文艺界的空前大团结。

“文协”成立后，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1）建立全国作家通讯网，推动各地分会的成立。曾先后在广州、香港、桂林、成都、昆明、延安、晋东南、贵阳、上海等地建立文协分会；同时出版了会刊——《抗战文艺》。在它指导下，各分会也办了不少刊物。《抗战文艺》共出了十卷七十一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是抗日战争期间影响最大的文艺刊物。各分会的刊物也发表了许多反映人民生活，拥护抗战救国、暴露敌人罪行，反对妥协投降的好作品。（2）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推动并组织作家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参加“作家战地访问团”、“抗日文艺工作团”等，实地参加战地文艺工作，使文艺更加广泛深入地为抗战服务，同时也培养锻炼了大批革命作家。（3）提倡文艺大众化，号召写通俗文艺，有力地推动了文艺大众化运动。老舍、欧阳山、张天翼、沙汀、艾芜等作家，当时就写过不少通俗文艺作品，并取得相当的成就，具有一定的影响。

“文协”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当时，周恩来同志正在武汉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不但亲自参加“文协”的许多活动，再三号召作家们学习鲁迅的精神，坚持“韧”性的战斗，努力创作宣传抗日救亡的好作品，而且经常关心作家们的生活，指导作家们的创作，教育和帮助许多

文艺工作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他亲自领导的《新华日报》上，对“文协”的工作和斗争，也经常地及时地给予指导和支持。正因为这样，所以“文协”不但在国民党的种种压迫和摧残下，仍然坚持斗争，大胆领导，而且大大地推动了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发展，为抗日救亡做出了巨大贡献。

“文协”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缺点。其一，有少数人对于文艺在抗战中的作用没有正确的认识，有所谓“文艺无用”和“投笔从戎”口号的提出；其二，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对国民党提出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号，缺乏正确的认识，放纵了以民族斗争掩盖阶级斗争的思想倾向。正如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所指出的那样：“也曾出现过由于强调抗日战争中的民族观点而比较忽略了阶级观点的思想倾向”。其三，没有充分理解“以斗争求团结”的统一战线原则，片面地强调了团结，忽视了内部的必要的思想斗争，致使一些反动文艺思想有所泛滥，使抗战文艺运动受到一定的损失。这也如郭沫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中所指出的那样：“有一些人在某些阶段上又忽略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原则斗争和严肃批评，产生了右倾的偏向。”

三、抗日文艺运动的发展

“文协”成立后，戏剧界、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等的抗敌协会也相继成立，形成了文艺队伍的大进军，推动了抗日文艺运动的发展，促进了文艺创作的繁荣。

（一）文艺运动的发展

国统区的抗战文艺运动，在武汉失守前后，形成了两种不

同的局面，也可称为两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武汉失守前。这阶段国统区的文艺运动，虽然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但一直是向前发展的。无论在宣传抗战、动员群众、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方面，也无论在使文艺与革命、文艺与群众的结合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时期的文艺创作，虽然内容不够深刻、艺术上有些粗糙，没有做到批判地继承旧形式等缺点，但从内容到形式也都有了新的特色。同时，通过和人民群众接触及参加实际工作，也使作家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不少人的思想感情开始转变。逐渐有了改造思想的要求。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抗战初期的形势时说：“全国各方面是欣欣向荣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趋势，文化上有较普遍的动员。”

第二阶段，武汉失守后。这阶段由于“政治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投降了敌人，其另一部分也想早日结束抗战。在文化方面，反映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叶青、张君励等人的反动和言论出版的不自由。”（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使抗战文艺运动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和迫害。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由消极抗日变为积极反共，禁止文艺工作者到群众中去，演剧队和宣传队几乎全被解散或被迫停止活动，朗诵诗运动也基本上转入地下，通俗文艺也被禁止。当时有一部分作家表现出消沉情绪，创作上也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但就整个来说，国统区的文艺运动仍然继续保持和巩固着广泛的统一战线，对反动派对抗战文艺的限制与摧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坚持了文艺为抗战服务的方向。

（二）文艺创作的繁荣及特点

这时期的文艺创作，也分两个阶段。即武汉失守前和武汉

失后前守。阶段（1937——1938年底）国民党被迫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作家活动比较自由，创作也能反映现实和配合抗战的迫切要求。后阶段（1939年1月以后），抗战进入困难的相持阶段。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采取“限止异党活动办法”，对进步的政治活动横加摧残，国统区文艺运动受到很大压制，使作家们被迫脱离火热的斗争，从反映伟大的抗战转入暴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与腐朽。前阶段大部分是小型创作与通俗文艺，缺点是热烈有余而深刻不足；后阶段却与前阶段不同，大型创作已经成熟，出现了坚实而优秀的作品。

诗歌创作大量涌现。为了战斗的需要，当时的诗歌创作，极力摆脱它那最不容易被群众接受的艰化形式，创造了很多新的形式。朗诵诗和街头诗就是当时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朗诵诗原在《左联》时期就提出过，抗战爆发后，由武汉开始兴起。它用比较明朗通俗的语言，为民族解放高唱赞歌。当时在各种集会上，在音乐会上或在电影、戏剧开场前，以及在广播电台，经常有诗朗诵节目。一九三八年，武汉还举办了街头诗画展。朗诵诗和街头诗运动，不但对宣传抗日，鼓舞人民斗争意志，起了很好的作用，而且扩大了诗的影响，推动了诗歌大众化运动的发展。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诗的时期。当时仅武汉一地，便有《时调》、《诗时代》、《五月》等诗刊。郭沫若的《战声集》，臧克家的《从军行》、《泥潭集》，蒲风的《在我们的旗帜下》，卞之琳的《慰劳信集》以及何其芳、田间、艾青、柯仲平的作品，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收获。这一时期的后一阶段，短诗逐渐减少，叙事诗和抒情诗却很快发展起来。力扬的《射虎者的家族》，臧克家的《古树的花朵》等叙

事诗和他的《泥土之歌》，冯至的《十四行诗》等抒情诗，都是较有影响的作品。

戏剧活动最为活跃。这时期的戏剧活动和创作都很活跃。抗战爆发后，上海成立的《全国戏剧界协会》曾组织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分赴各战地演出。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推动和组组了戏剧工作者走向战地、农村宣传、演出。在周恩来同志亲自关怀下，由郭沫若主持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组织了十个抗敌演剧队，五个抗敌宣传队，经常深入各战地演出。前阶段主要是街头剧、活报剧、独幕剧；后阶段主要是历史剧。前阶段戏剧都以抗战为主题，情节简明，感情激昂，鼓动力强，演出时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有很大的宣传效果。《放下你的鞭子》、《上前线》、《最后一计》、《三江好》等几个有名的剧本，在当时都上演过千百余场。独幕剧的创作量也很大，据统计，到一九三八年已有一百四十多种。其中主要的有适夷的《S.O.S》，崔嵬的《张家店》，宋之的的《黄浦月》等。后阶段的戏剧较前阶段有了很大的发展，主题更深刻，技巧更圆熟，产量更丰富，达到了新的水平。这时期除取材于历史，服务于现实的历史剧外，也有一些其他题材的作品。前者有郭沫若抨击蒋介石投降主义的《屈原》和阿英的《碧血花》、欧阳予倩的《梁红玉》等启发爱国主义的作品；后者有曹禺的《蜕变》、老舍的《残雾》、沈浮的《重庆二十四小时》等揭露大后方的黑暗和官僚主义的腐朽，反映沦陷区人民生活的作品。

报告文学空前繁荣。抗战初期曾广泛提倡的报告文学，这时期因为它具有能迅速及时地反映现实的特点，而吸吮着抗日斗争的乳汁，空前繁荣起来。本时期的报告文学数量很大，

紧密配合政治任务和斗争形势，及时反映了抗战初期的各种生活现实，充分发挥了文艺轻骑兵的战斗作用。这时影响较大的报告文学作品有丘东平报道国民党士兵抗日士气与军官贻误战机罪行的《第七连》，曹白报道东江游击队战斗成长的《呼吸》，周立波报道解放区军民生活的《晋察冀敌后印象记》，沙汀报道解放区军民生活的《敌后琐记》等。这些作品，不但报道了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也反映了党领导下解放区人民的生活风貌和斗争活动。

通俗文艺和小说创作也相当活跃。前阶段的通俗文艺及时地反映了抗战的内容，其形式有鼓词、大众小说、地方戏等，代表作品有老舍的京剧鼓词和赵景深的大鼓词《平型关》等，殴阳山的大众小说《三水两农夫》、《好邻居》等，以及张天翼、沙汀、艾芜合著的《芦沟桥演义》等。后阶段的小说也都以抗战为主要内容。其中有茅盾描写上海各阶层对抗战的反映的《第一阶段的故事》和吴组缃反映农民在抗战中的觉醒和力量的《山洪》；还有巴金描写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思想变化与发展的《火》和老舍描写小城镇人民抗战的《火葬》。此外，还有茅盾揭露国民党特务统治罪行的《腐蚀》及沙汀、艾芜、张天翼等作家以暴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与日寇罪行的作品。

从文艺创作的繁荣景象来看，这时期文艺创作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各种短小精干的文艺作品的大量涌现，如朗诵诗、街头诗、活报剧、街头剧、报告文学等；二是利用旧形式的通俗文艺得到蓬勃的发展，如各种鼓词、大众小说和地方戏曲等；三是取材于历史，服务于现实的历史剧的新发展。

第二节 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边区和国统区都开展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这个讨论是一九二八年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的继续和发展，对建立文学的民族形式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这次讨论的起因

引起这次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抗战爆发后，新文艺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文艺的民族化和大众化问题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没有较好地与人民群众结合，为抗战宣传服务；“文章入伍”和“文章下乡”之后，虽然涌现出了大量的通俗文艺作品，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要从理论上解决文艺如何继承民族传统，适应群众要求和抗战需要，急需开展一场学习和讨论。其二是，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报告中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一九四〇年毛泽东同志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文化应该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的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光辉论述，不但是反对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重要武器，而且是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艺的行动指南，因此引起了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界的广泛重

视和学习讨论。

二、讨论经过和涉及的主要问题

这次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首先在解放区开始，接着就在国统区进行。解放区的讨论，主要是在一九三九年；国统区的讨论，主要是在一九四〇年。前后持续将近两年的时间。

(一) 解放区的讨论。一九三九年，延安文艺界在学习毛泽东同志有关文艺“大众化”、“民族化”问题指示的时候，联系文艺运动的实际开展讨论。当时延安的《中国文化》、《文艺战线》等刊物发表了周扬、艾思奇、何其芳等同志不少文章。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主要阐述了下列三个问题：

第一，“五四”以后的新文艺与民族化、大众化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五四”以后的新文艺，在其发生、发展的基本趋势上，不是越来越远离民族化、大众化，而是越来越接近民族化、大众化。指出新文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脱离群众，脱离生活，写得不象，看起来难于习惯的缺点，但在接受外国影响和利用旧形式，创造新形式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要进一步实现文艺的民族化和大众化，除了直接向现实生活去找原料之外，就不能不向作为旧生活之反映的旧形式旧作品去寻求援助。

第二、利用旧形式与发展新形式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利用旧形式，是为了发展新形式，也就是把民族的、民间的旧有艺术形式中的优良成分吸收到新文艺中来，给新文艺清新健康的营养，使新文艺更加民族化、大众化。周扬在《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一文中，首先肯定了新形式比之旧形式，无论如何是进步的，字汇、语法、体裁都更丰富、自